

2013 第二十一辑

中国西南文化研究

茶·交通·贸易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

杨福泉 主编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

第二十一辑

中国西南文化研究

茶·交通·贸易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
杨福泉 主编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西南文化研究. 第21辑, 2013. 茶·交通·贸易/杨福泉主编;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222-11788-4

I. ①中… II. ①杨… ②云… III. ①文化史—研究—西南地区
②茶叶—文化史—研究—云南省—近代③交通运输史—研究—云
南省—近代④贸易史—研究—云南省—近代 IV. ①K29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1494号

出品人 刘大伟

责任编辑 郭木玉 武 坤

装帧设计 张力山

责任校对 郭木玉 武 坤

责任印制 马文杰

书名 中国西南文化研究2013 (第二十一辑) 茶·交通·贸易

作者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 杨福泉 主编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ail ynrms@sina.com

开本 889mm×1194mm 1/32

印张 8

字数 230千

版次 2014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云南君和印务包装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11788-4

定价 32.00元

如有图书质量及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审校部电话: 0871-64164626 印制科电话: 0871-64191534

序

杨福泉

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献研究所具体编辑，西南数省历史文化学界同仁加盟和支持的《中国西南文化研究》，迄今已经出版了20辑。正可谓涓涓细流，汇聚成河，小树生长，日久成林。这套论集，如今已经汇集了一批研究西南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成果。这套论集最初聚焦西南历史文化，发表了很多有分量的基础研究之作；后来，论集也注重西南历史文化变迁的研究，从历史学、文献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角度来凝视西南，研究西南，在原来的基础上拓展了研究领域和视野。

一个区域学术的发展和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要有长年累月的积累。对中国西南历史文化的研究，从方国瑜、江应樑等前辈学人，到童恩正、李绍明等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学界才俊，筚路蓝缕，辛勤耕耘，做出了卓尔不凡的成就，献出了他们毕生的心力，他们的学术生命，如蜡炬之光，照亮了后学者之路。一代代学人的努力，使西南历史文化研究之路群贤毕集。他们淡泊明志，甘于寂寞，互相切磋砥砺，收获春华秋实。当代中青年学人弘扬前辈学人的治学精神，借鉴他们的研究方法，但又不忘独辟蹊径，补遗拾阙。已出版的这些论集中，不乏珠玑之见，创新之论。

我一直认为，中国文化浩博宏富，洋洋大观，要建构中华之学的宏伟大厦，必须要从一砖一瓦开始，所以，各个区域之学，单一民族之学，是中华之学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治学自然要有高屋建瓴的宏观鸟瞰和研究，但宏观研究要建立在诸多深钻研、

发微阐幽的微观研究之上，只有把区域之学、微观之学做好了，才能有扎实牢固的基础来构建宏观之学，就如盖房子一样，基础要打好打牢，否则就会有空疏浮泛和头重脚轻根底浅之弊。我们这套论集，立足西南边疆，聚焦西南文化，就是以这样的学术理念来治西南之学，为中国的学术大厦增砖添瓦，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园林培植花草。我相信，如此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天长日久，必见正果。如果将中华文化的研究也比喻为一条大江，那这套论集能成为汇聚涓涓细流的一条小河，流入这条大江，那也就非常有意义了。

当今中国，正在发生社会文化的重大变迁，西南边疆，概莫能外。我们既要沉潜学海，钩沉考证，梳理国故，又应直面现实，深入草根，关注民生，有所心得，发而为文。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以学子拳拳之心，尽书生绵薄之力。这也是《中国西南文化研究》的主旨。

是为序，与同仁共勉。

2013年8月

目录

清代茶与滇南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蒋文中	001
滇茶史辑.....	江 燕	013
茶马贸易与汉藏民族关系.....	蒋文中	038
云南近代交通发展概述.....	何斯民	053
普洱茶与清代滇藏贸易		
——兼论“茶马古道”的路线问题.....	王丽萍	062
茶与滇藏交通贸易.....	蒋文中	073
近代贵州对外贸易研究.....	马 琦	088
近代云南“走夷方”的历史考察.....	黎志刚 杨永平	117
个旧锡业全球化：基于产销关系的考察		
（1644—1911）.....	马 琦 刘 欣	133
茶的政治功用与固边大政.....	蒋文中	155

中国茶文化中的耀眼奇葩

——普洱茶与云南民族茶文化 钱稳林 179

茶马古道上的马帮文化 敏塔敏吉 193

《研究集刊》总目索引 申 旭 辑 录 202

《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和《云南现代资料丛刊》

总目索引 申 旭 辑 录 230

清代茶与滇南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蒋文中

历史上，地处边疆的云南少数民族虽然被称为“蛮人”，他们却是最早种茶喝茶的民族。茶对于云南民族至关重要，特别是在滇南民族地区，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

一、云南民族先民古濮人是最早种茶民族

千百年来举足轻重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起源于云南和土生土长在这里的古老民族先民。迄今的大量研究证明，云南不仅是世界茶树的原产中心，云南也是中华民族茶文化的摇篮和茶马古道纵深最长的源头。

从世界茶树的原产中心看，至目前，全世界发现茶属植物 40 种，几乎都在中国，云南有 33 种之多，占 82.5%，且不断有新种和变种发现，足见云南是茶树起源的中心。关于茶树的原产地，过去以英国的植物学家的最早研究为依据一直认为在印度阿萨姆。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张宏达教授把阿萨姆茶种改称为普洱茶种。多年来，世界各地专家无数次地深入产区考察和反复研究论证指出：云南的西南部才是阿萨姆茶种的原产地，即阿萨姆茶种源于云南。普洱茶是茶植物分类系统中的原始茶种。1998 年张宏达教授主编《中国植物志》时，在山茶科的分类文献里，把印度阿萨姆茶改为中文名

字，正式命名为普洱茶。

1978年，在景谷发现的距今约3540万年的古宽叶木兰化石进一步证实了茶树起源于云南。1993年4月，在“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中国古茶树遗产保护研讨会”上，来自9个国家和地区的181名专家学者亲临现场，对澜沧邦崄千年古茶树王进行了考察，认为：“澜沧邦崄古茶树通过染色体组型并与云南大叶种和印度阿萨姆种的核型进行对比，结果发现在邦崄大茶树核型的对称性上，云南大叶种比印度阿萨姆种的对称性更高。云南邦崄大茶树是较印度阿萨姆种更原始、起源更早的茶树，是野生型向栽培型过渡的过渡类型。”这一结论轰动了世界，它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而云南是茶树的原产中心。这可说是颠覆世界有关茶叶原产地论断的重大科学突破。

千万年来，世界上的生态乃至物种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早期的茶树已难觅踪影，但云南目前尚遗存分布着庞大的古茶树群落，不仅大量集中分布着世界最原始古老的野生茶树和现存野生大茶树，而且还大量集中分布着世界最古老的过渡型和栽培型大茶树。据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研究所调查，目前在云南27个县境内发现有古茶树，1000亩以上连片古茶园共14片，面积达21.21万亩，现存有野生型、过渡型、栽培型类型千年以上古茶树32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云南临沧凤庆香竹箐3000多年的栽培型大茶树，它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古茶树，如果考虑到它是栽培型的，对人类茶文化的历史将具有无与伦比的意义。这株“地球上最大的古茶树”，其树龄超过3200年，是人类3000多年悠久种茶历史的有力证明。

如果把临沧凤庆香竹箐大茶树与史料记载相对照，可知商周时西南夷中的濮人已经种茶。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其地东至鱼腹，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苧，鱼盐铜铁，丹

漆茶蜜……皆纳贡之。”^① 吴觉农的《茶经述评》认为：当时所指巴蜀包括今四川省及云南、贵州两省部分地区。《史记·周本纪》载，周武王在公元前1066年率领南方包括濮在内的八个部族国讨伐纣王。

据方国瑜等学者考证，其中的濮族均祖居云南，分布面广，周秦时期称为百濮，其后裔分支很多，历代称呼为朴子、朴子蛮、布朗、蒲蛮、哈瓦、崩龙等。唐樊绰《蛮书》卷四载：“朴子蛮，开南、银生、永昌、寻传四处皆有。”“朴子蛮”，即是今佤族、布朗族和德昂族的先民。方国瑜在其论著中说：“在景东、景谷、普洱、思茅、西双版纳、澜沧、耿马、临沧、镇康、云县、保山诸处居民，都有蒲蛮族，自称‘布朗’，以往记录濮、朴、蒲，都是布的同音异写，又布朗族与佤族（自称布饶、布幸）、崩龙族（自称布雷，即今德昂族），语言同一属系，族属亦相关（称蒙古族，亦称南亚语族），古濮人分别名号甚多，当包有今布朗、阿佤、崩龙（德昂）诸族之先民。”^② 又据史料记载，濮人曾向商王朝献短（或曰矩）狗；清顾炎武《日知录》也说，明清时期规定云南顺宁府的蒲蛮以矮犬为贡品；《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诸葛亮定南中后将永昌郡濮民数千移至云南郡和建宁郡园田。

由上可知“濮人”是云南澜沧江流域最古老的原住民族先民，史书称“朴子蛮”。濮人祖居云南并有悠久的种茶历史。今云南境内的布朗族、佤族、德昂族便是濮族后裔。《云南各族古代史略》载：“布朗族和崩龙族（历史上）统称朴子族，善种木棉和茶树。”^③ 20世纪80年代，在澜沧江中下游地区发现许多新石器，属忙怀类型，而忙怀类型属百濮的文化遗存。在今天的田野调查中，研究者们找到了大量民族茶文化的资料，更加进一步丰富了普洱茶的文化内涵，

① 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② 方国瑜著，林超民编：《方国瑜文集》第四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页。

③ 《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50页。

并充分证明了云南少数民族先民中的古濮人是普洱茶最早的创造者。

结合史料看，三国魏吴普《本草·菜部》：“苦茶一名茶，一名选，一名游冬，生益州川谷山陵道傍，凌冬不死，三月三日采干。”^①“益州”系西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滇王尝羌臣服于汉设益州郡，郡治在滇池县（今晋宁县的晋城），领27县，包括今曲靖、玉溪、昆明、大理、保山等地（州市）的辖区。东汉明帝时在滇西设永昌郡之前，先设西部都尉，仍归益州节制。该史料说明汉晋时期，云南就已有茶树种植。蜀建兴三年（225），诸葛孔明平定南中（从东汉末起，南中是全滇和黔西北、川西南的总称）后，在南中地区倡导种茶，发展南中地区经济，使南中茶叶颇负盛名。

早期云南民族种茶是以食用为主。唐樊绰《蛮书》：“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②唐懿宗咸通四年（863），唐朝使节樊绰出使南诏。根据方国瑜先生考证，所谓“银生城”即南诏所设“开南银生节度”区域，在今景东、景谷以南之地。产茶的“银生城界诸山”在开南节度辖界内，亦包括当时受南诏统治的今西双版纳产茶地区。上述史料是有关我国云南少数民族用茶、饮茶的明确记载。

二、滇南民族种茶业的发展与普洱茶的兴起

三国两晋时期，孔明兴茶开启了早期云南民族种茶业的发展。据南宋李石《续博物志》载：“云茶山有茶王树，较五茶山独大，本武侯遗种，今夷民祀之。”^③1807年，清师范《滇系·山川》载：“普洱府宁洱县六茶山，曰攸乐……皆多茶树。六茶山遗器孔明留铜锣于攸乐，置芒于莽枝，埋铁砖于曼砖，遗木梆于倚邦，埋马镫于革登，

①〔唐〕陆羽：《茶经·七之事》，西泠印社2011年版。

②〔唐〕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卷七，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页。

③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置撒袋于曼撒因以其名。又莽枝有茶王树，较五茶山独大，传为武侯遗种，夷民祀之。”^①史料中有关孔明与茶的记载很多，孔明被云南种茶民族尊为“茶祖”并祭祀至今。

从历史研究看，公元225年农历七月二十三日，蜀国攻吴失败，南中诸郡皆叛。诸葛亮兵分三路亲自南征。以“和抚”战略，五月渡泸，追击孟获七擒七纵，四郡皆平。诸葛亮返蜀前采取一系列巩固政权措置，将南中进一步郡县化，以巩固强化政权。在经济上，开垦土地，广种粮茶，南中出现了安定和睦、经济发展、欣欣向荣的局面。孔明率大军平定南中后，为安定后方，对当地少数民族采取优抚政策，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孔明教民广植茶园发展茶叶的民间传说很多，很多民族将他奉为茶祖。如西双版纳六大茶山之一的攸乐，传说是诸葛南征时丢落了一支队伍，教其就地以茶为生，该地被称丢落，后丢落传音攸乐。西南诸夷对孔明怀柔很有感情，代代相传，并称革登山茶王树为孔明树，古茶山称孔明山，称孔明为茶祖，举办茶祖会。在普洱等地，每年七月二十三日孔明生日，即以大茶树为寄托举行祭祀活动。各民族为感恩孔明，每年清明前后新茶上市都要祭祀孔明，并尊其为茶祖，供奉于村寨和家庭之中。

古之南中一部分的今之云南省境内，还存活许多树龄千年以上的古老大茶树，与孔明兴茶的传说相吻合。孔明因地制宜教民种茶，发展经济，以资钱粮是可信的。此外，孔明深知处理好民族关系，关键在于倡导各民族团结和睦相处，他们向他们灌输茶文化，饮茶敬茶，潜移默化地改造他们的性格，使其向和平文明性转变。孔明借茶教化人民，“以茶治边”，达到治国安邦、长治久安的目的，把茶文化与政治巧妙结合，用意深远。

云南无比丰富的茶资源和悠久的茶业发展历史毫无疑问对中国内地特别是不产茶而又对茶叶有需求的地区产生了巨大吸引力，尤其从明代后期开始，产于滇南的普洱茶因其独特品质受到内地的欢迎，而

^①《滇系》第六册，光绪云南通志馆刊本。

从云南众多茶中脱颖而出。特别是普洱茶在味厚耐泡消食化滞等方面的优越性，更受到西北游牧民族欢迎，成为云南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名茶而声名远播，滇南也由此成为云南普洱茶最大的生产区和茶马古道最南段的运茶源头和起点。

普洱茶在中国名茶中是非常难得的一种独特茶类，具有茶叶肥壮、叶质柔软、浓绿，芽头壮实、白毫显露等特点，冲泡饮用时色泽乌润、香气馥郁、汤色明亮、醇厚回甘，毛尖清香如荷、新绿可爱，内质外形兼优，不仅具有一般茶叶解渴、提神、明目、解油腻的作用，还有消食、化痰、利尿、解毒、减肥等功效，且特别耐泡，易于久存，时间越长越好喝。普洱茶所具有的这些优良特性以及独特的制作方法，使其在明清后成为中国名茶并迅速发展起来。

普洱茶名源起于何时，近10年随普洱茶宝贵历史文化价值和品饮保健价值被广为认知及在市场经济中异军突起，学界对普洱茶历史及文化的研究相当多。从2004年至今，笔者亦在对普洱茶历史文化不断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先后出版了《云南民族文化探源》《中国普洱茶》《中华普洱茶文化百科》《云茶大典》《古茶乡韵》等著作及相关论文数十篇，在前期的研究中，笔者与其他专家均认为普洱地名也因集散“濮儿茶”而得名，成为同音异写的“普洱”。^①但随研究的不断深入，笔者对普洱茶的得名及发展又有新的发现。这还是因史料的不断发现而展开。

清章履成《元江府志》载：“普洱茶，出普洱山，性温味香，异于他产。”^②“普洱茶，出普洱山”，是有关云南普洱茶的产地的一条重要史料。笔者用数年时间对所有能找到的有关云南茶史料的记载进行了充分检索研究，发现过去认为普洱茶名称是因为普洱府是茶叶集散地而得名是一种误解。笔者从云南省图书馆除查到《元江府志》原件外，还查到一幅地图，清楚标明了普洱山位于今普洱市宁洱县（原

① 蒋文中：《中华普洱茶文化百科》，云南科技出版社2006年版。

② [清]章履成：康熙《元江府志》卷一，云南省图书馆藏，第666页。

普洱县)。说明普洱茶因普洱山而得名,随普洱茶名声大振而其主要的集散地普洱也因茶而得名。^①

普洱茶在清初便已列入贡茶案册,云南布政司每年要用1000两银子交思茅厅负责采办普洱茶进献皇上。普洱贡茶是来自云南深山老林中原始大茶树的茶菁,茶汤特别浓酽醇厚,饮了有去油腻助消化之功,因而深受朝廷欢迎,特别受到养尊处优、饮食珍馐的贵族官吏们的喜爱,于是云南普洱茶清代在京城名声大振,社会咸闻。清阮福《普洱茶记》说:“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②云南每年向清宫进贡普洱茶的定例一直延续到清朝末期,前后共有200年左右。

清廷每年收纳的普洱茶,除了供清宫皇家饮用或分皇亲国戚外,还被选作中国高级土产品礼品茶赠送给外国使节。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九月十四日,乾隆皇帝在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接见英使团,赠英使团大批珍贵礼物,其中就有大量普洱茶、女儿茶和(普洱)茶膏。^③

三、普洱茶带动下的滇南民族经济文化的大发展

清代随普洱茶的制作及品饮价值越来越好,名声更日益远播。朝廷对普洱茶的重视并把之列为贡茶,更极大地推动了普洱茶的迅速发展。清檀萃《滇海虞衡志》卷十一《志草木》中写道:“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岗,六曰慢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④

① 蒋文中:《普洱茶得名历史考证》,《云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② 道光《云南通志·物产三·普洱府》,《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二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28—529页。

③ 王郁风:《普洱茶与清皇朝》,《中国普洱茶文化研究——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云南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

④ 道光《云南通志稿》卷七十《食货志·物产·普洱府》。

盛产普洱茶的六大古茶山位于云南西双版纳。成为贡茶使普洱茶的生产贸易在清代达到鼎盛时期。清雍正年间（1723—1735），石屏、四川等地汉族大量进入六大茶山制茶卖茶，进一步带动了当地少数民族的茶叶种植。乾隆嘉庆年间，茶区农民开山种茶，大建茶园。从乾隆初年至光绪初年，勐腊县境内五大古茶山周围已800里，年产茶叶上万担。据道光《云南通志》第34卷、100卷记载，18世纪20年代，包括基诺山在内的六大茶山“每年约产茶六七千驮”，平均每座茶山产茶1000余驮。

清政府因普洱茶而起的对普洱府地区的开发，极大地促进了滇南这一广袤边陲的各民族同内地的紧密联系。如元江以南的他郎厅（今墨江县）在道光年间“汉民皆非土著，系由黔安、建水、石屏、新兴及川、广流寓而入籍，耕读贸易，习以为常”^①。这里所说的皆非原住汉民，尚系登录于官府户籍者，其他未经入籍而生活在深山中的“流民”尚不知凡几。

普洱作为以茶叶收售为主要交易商品的集散中心，吸引了各地客商云集，仅西藏一地“年有千余藏族商人到此，印度商族驮运茶、胶（紫胶）者络绎于途”。每年印度、缅甸、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各国商人都来往于普洱经营普洱茶，省外以及省内等地商人络绎而来，经营茶叶、棉花、杂货等，外地客商的到来也带来了各种先进的手工业加工技术，促进了普洱在普洱茶加工包装等方面的提高。各地客商在普洱集资兴建了很多的同乡会馆，如著名的四大会馆（江西会馆，又称万寿宫；两湖会馆——寿佛寺；秦晋会馆——小关庙；四川会馆——川主庙）、四方会馆（抚州、庐陵、吉安、建昌）和五小会馆（石屏、建水、新峨、通海、玉溪）。由于茶叶生产的发展，制茶业也建立和发展起来，数十家茶庄先后矗立于大街小巷之间。随各地商旅纷纷在普洱开商号，设立茶庄、茶号，城市日渐发展，商业遍布街市，人马络绎不绝，各种服务业、文化事业、手工业均得到相当程

^① 道光《元江府志》卷九。

度的发展。普洱成为当时衔接内地与边疆并通达东南亚诸国贸易、商品交流的货运中转地和普洱茶加工、贸易的中心集散地。

从清顺治、光绪至民国年间,平均每年约有驮马五万匹来回于滇西、滇南及缅甸、越南、老挝等地运输茶叶,随着茶叶运输的繁忙,客栈、食宿、商店也应运而起,生意兴旺,第三产业在交通沿线发展起来。国内外茶叶市场销售量的增加,普洱茶市场的扩大,引来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侵占、掠夺利益的野心,他们瞄上了普洱这个当时中国具有相当规模的茶叶制作贸易中心城市。1897年7月2日,法国强迫清政府在普洱建海关、划租界。1902年5月8日,英国也在普洱开商埠,设领事,普洱成为国际通商口岸。民国《续云南通志长编》载,普洱产区在民国十年(1921)以前,年产茶达3.5万担,茶庄近90户,年经销茶2万担左右。民国十七年(1928)纳税茶叶1.67万担。民国十八年(1929)纳税茶叶1.97万担。

普洱在自清雍正至民国时期200多年的时间中成了名副其实的普洱茶生产、加工、朝贡、销售、出口的贸易中心集散地。普洱兴盛时期,茶业成为普洱的经济命脉,茶马古道的拓展和延伸将普洱同各茶山、西双版纳和外地连接起来,产自普洱及周边地区的茶叶都要运到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贸易中心普洱,经过加工、交易后,源源不断地通过茶马古道运往全国及东南亚、中东、欧洲各国。马帮将普洱茶驮运到国内外后,又将那里的工业品、土特产品驮运回普洱交易,各路商贾、各地马帮云集普洱互通有无,各得其利。普洱在漫长的200多年历史中曾经是繁荣兴旺的普洱茶集散贸易中心,是茶马古道最重要的源头和各民族文化交流中心。

随着普洱茶的发展,许多内地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也被带到了西双版纳六大茶山,形成了民族经济文化的大融合。

古六大茶山,有傣、彝、苗、瑶等少数民族,明代以前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但随茶业的兴盛,从明代起随内地汉族不断进入,汉文化也大量传播进六大茶山。曼庄关帝庙建于清乾隆六年(1741)春一月,石屏会馆就设在其内,现今有一块建大庙时的功德碑,此碑实际

上就是建关帝庙后而立的，目前保存在丰绍康家（原茶叶大户丰家的后代），大碑上刻着“蛮砖为六大茶山之一”的文字。这块碑上关于六大茶山地名的记载，比清人檀萃所撰的《滇海虞衡志》中六大茶山地名的记载早 57 年。说明至少在明朝末年已有江西人、四川人进入曼庄一带经商贩茶。

易武茶山在六大茶山中所产茶叶位居榜首，被称为“六大茶山之首”。易武位于勐腊县城东北部，东面与老挝交界，民族以傣、彝、瑶、苗族为主。主要经济作物是茶。明代随茶业的兴盛，内地汉族不断进入易武，汉文化也大量传播进易武。从明代嘉靖末年随易武士司势力的动摇，汉族茶农茶商前来更多，地主经济开始出现，特别是从乾隆至道光年间，茶山经济的发展不断吸引了大批汉族移民迁入，进一步加速了土司制度的衰落，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到茶山淘金的各行业商贾们也纷纷至沓来，他们在易武一带开作坊、设店铺，开展各种贸易活动，商贾云集，易武在清代人口最多时超过万人，形成八大村寨，建有寺庙、会馆、街道、学堂、中式居民楼房。道光年以后，易武逐步成为六大茶山普洱茶的集散中心和商业中心，一时间茶号、商号大增。南来北往的商人，不仅卖茶，还卖棉花、药材，英、法等国产的日用品如洋布、洋油等商品也出现在易武街铺上。

在内地来易武的汉人中，石屏人较多，石屏人素以重文崇儒闻名，易武人也以金榜题名诗书传家为荣。嘉庆年间易武已有私塾，咸丰至光绪年间易武出了三位进士，一位武进士黄席珍，两位例贡进士李开基和车顺来，李开基、车顺来都曾向光绪皇帝贡过茶，车顺来还得过御赐瑞贡天朝的大匾。

汉族信奉各种神灵、崇拜英雄圣人，汉族还注重同乡故里宗亲氏族关系，为了精神理想的寄托，为了同乡故里宗亲氏族的联结，汉族热衷于建盖庙宇、会馆。今在易武古镇，仍可见茶马古道、茶案碑碑文、关帝庙等碑碣、遗址。在易武老街、麻黑、曼秀、易比、漫撒、弯弓、曼腊、曼乃等村寨，村村有关帝庙，信奉关帝成为大多数茶商、茶农的精神追求和寄托。他们将关圣公忠、义、仁、勇的高尚品格作为自